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運動」—第三世界的「歐共主義」？

doi:10.30390/ISC.198211\_22(2).0008

問題與研究, 22(2), 1982

Wenti Yu Yanjiu, 22(2), 1982

作者/Author：劉天均

頁數/Page：80-9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2/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1\\_22\(2\).0008](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1_22(2).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運動」

劉天均

## ——第三世界的「歐共主義」？

### 一、前言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運動」(Movimiento al socialismo—MAS)是「委內瑞拉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Venezuela—PCV)一九七〇年底第二次分裂的產物。目前它已是委國的第三大黨，現有「黨員」十八萬<sup>①</sup>，是委國政黨政治上最具發展潛力的左派新生力量。「社會主義運動」(以下簡稱「社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政治組織，它不願稱「黨」，而名之曰「運動」，因為「黨」這個名稱在委國人民心目中是一個「尚黑」的東西，往往為人所不齒<sup>②</sup>。而它更不肯掛起「共產黨」的招牌或冠上「共產主義」的頭銜，因為「共產黨」及「共產主義」在委國人民的記憶裏是一個不祥的稱號，由於「委共」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所採取的「暴力路線」對委國人民製造了許多罪行，故為他們所深惡痛絕。

但委內瑞拉人民卻對「社會主義」以及對與社會主義有關的思想與政策有着濃厚的興趣與偏愛，這股偏愛的情緒與其親身的經歷發生直接的關係。即任何一個曾經身為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新興國家，尤其是一個曾經深受貧困之苦和親歷帝國主義政治壓迫及經濟剝削的弱小國家，均有偏愛社會主義的政治傾向。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國政治黨派喜歡在名義上打着「社會主義」或「左」的旗號，或在實質上主張推行某種形式之社會主義政策的理由。

然而必須首先說明的，即「社運」在本質上是一個共黨組織，是一個與「歐洲共產主義」相近的共產組織；而絕對不是一個

① The *Europa Yearbook* 1981, London, Vol. II, Venezuela, pp. 1730-50.

② 現在委國政黨林立，大小左右黨派二十多個，其中半數以上均不以「黨」名之，或稱之為「運動」，或名之曰「行動」，或「陣線」，或「聯盟」，甚至以「目標」自稱，如 Causa Común (共同目標)。

「社會黨」，也非「社會民主黨」，所以它沒有加入「社會主義國際」<sup>③</sup>。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之一。其次，本文擬就該「社運」這個特殊的共產組織在第三世界中出現，可能對第三世界共黨，尤其對拉丁美洲共黨，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試加探討；並對其將在委內瑞拉政治舞臺上可能扮演之某種角色，及其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反應方式，作審慎的預測。這是作者一項冒險的嘗試。

## 二、委內瑞拉共黨的內爭與分裂

「委內瑞拉共產黨」自一九三一年五月創建以來，在半個世紀中曾發生過三次大分裂。第一次分裂發生於一九四四年，結果有兩個共黨組織同時存在，一個保持着原來的「委內瑞拉共產黨」名稱，或被稱之為「紅色共產黨」；另一個則改稱「統一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Unitario—PCVU)<sup>④</sup>，當時被呼之為「黑色共黨」<sup>⑤</sup>。此次分裂狀況直延至一九五二年「黑黨」自動解散為止。

「委共」第二次大分裂，始於一九六九年，演變至一九七一年春，終於分裂出一個「社會主義運動」來，為本文所討論之主題。

三年後，「委共」又在一九七四年發生了第三次分裂，此次分裂又產生了另一個共黨組織——「共黨統一先鋒」(Vanguardia Unitaria Comunista—VUC)。其實，在「委共」建黨五十年之短短歷史中，除了上述三次較重大的分裂之外，尚有其

註③ 「社會主義國際」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底在西德成立，現有成員黨四十三個，其中十一個屬於拉丁美洲的十個國家。「社會主義國際」有四種不同地位的成員黨：正式成員黨、咨詢黨、兄弟黨、聯繫黨派。一九七六年五月在委國首都卡拉加斯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十六個拉丁美洲的政黨派代表參加，次年成立了一個拉丁美洲特別委員會，嗣後正式成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委員會」，而委國的「民主行動」黨(Acción Democrática)被接納為該「國際」的「聯繫組織」之一(目前十一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十四個黨派參加了「聯繫組織」)，而「社會主義運動」不與焉。由此可見，「社運」不是一個「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之流的政治黨派。

註④ 「統一共產黨」於一九四七年復更名為「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Proletario Comunista—PRPC)。

註⑤ 一九四七年委國舉行選舉，根據一九四六年「民主行動黨」政府所頒佈的選舉法規定，凡十八歲以上的國民不論其教育程度如何，均享有公民權。但由於文盲比數相當高，故規定可由各參加競選的黨派自由選擇表徵其黨派之選票顏色，以便文盲投票人之辨認。因此，「民行」黨選擇白色，「社會基督教黨」選綠色，「民主共和聯盟」選咖啡色，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黨」選黑色，「委共」選擇紅色，從此兩個共黨組織即分別被稱之為「黑色共黨」及「紅色共黨」。

他零星的分裂，不能一一列舉<sup>⑥</sup>。

由於本文以討論「社運」爲主，故須對「委共」第二次分裂略加陳述。這樣不僅有助吾人瞭解其分裂因素，並可從其分裂因素中，間接地洞察「社運」這個新共黨的政治取向。「委共」第二次大分裂係由於下列諸因素：

(一) 鬭爭路線之爭：當「委共」在一九六一年初採取「武裝鬭爭」的暴力路線而於一九六六年春面臨決定性的失敗時，「委共」具有影響力的高級領導幹部，如馬克茲 (Pompeyo Márquez) 和柏考夫 (Teodoro Petkoff) 等，曾向委共中央提出一項聯合聲明，要求立即停止由「委共」與「左翼革命運動」(Movimiento Izquierdista Revolucionario—MIR) 所聯合發動的城市恐怖活動及鄉村游擊戰爭，改採溫和的「合法鬭爭」，以便參與一九六八年底的大選。「委共」中央立即因馬、柏二人的聯合聲明，爆發了鬭爭路線的論爭。結果，「委共」因迫於內外形勢，而於一九六七年夏季正式宣佈終止武裝鬭爭。

停止武鬭後的「委共」，雖然獲准以「前進聯盟」(Unión Para Avanzar—UPA) 參加一九六八年大選，但選舉結果僅獲得百分之二點八的選票，在參院獲得一席，眾院得到五席<sup>⑦</sup>。此一選舉結果與其參加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三年選舉，「委共」因採暴力路線而被禁，故未能參加) 大選所得百分之六的選票相比較，其得票率下降達百分之六十以上<sup>⑧</sup>。此一失敗，一面證明「委共」採取「暴力路線」是一項絕對的錯誤，一面顯示「委共」內部的路線鬭爭有其社會與政治的實質利益基礎。這一實質利益既是「委共」分裂的因素之一，更是「社運」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之一。

(二) 黨內改革的要求：「委共」內部以柏考夫爲首的「新左派」和「共青團」(Juventud Comunista—JC) 的新秀們同聲要求「委共」當局給予黨員以充分的言論自由，並嚴格遵循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他們尤其主張在一九七〇年的代表大會召開前夕，黨員在政策制訂過程中，除了直接影響黨的安全問題之外，有權透過其機關報，對任何事物或決策進行公開辯論<sup>⑨</sup>。當時「委共」內部少壯派的自由呼聲與民主浪潮恰好與另一個共產黨——捷共的「自由化運動」遙相呼應。二者在時間上也許是一種巧合，但在渴望自由與要求民主的理念上，毋寧說是出於同一個源頭——新的人文主義的要求。

(三) 捷克事件的衝擊：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布拉格之春」，在「委共」內部引起了一陣巨大的震撼，一如它在某些別的共黨組織所引起的一樣。然而所不同者，則是「委共」竟因此一震撼而直接地導致了分裂。「委共」政治委員之一的柏考夫首先對蘇聯

註⑥ 「委共」在一九四八至五〇年，與另一政黨「民主行動黨」一同遭到荷瑞茲 (Marcos Pérez Jiménez) 政府的壓制時，「委共」即與「民行」密謀，準備聯合軍隊發動政變，因此，引起「委共」內部的一次小型分裂，並同時被宣佈爲非法組織。

註⑦ Benedict Cross, "Marxism in Venezuela",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II, No. 6 (Nov.-Dec. 1974), p. 60.

註⑧ David J. Meyers, "Venezuela's, MA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XIII, No. 5 (Sept.-Oct. 1980), p. 18.

註⑨ Eleazar Diaz Rangel, *Como Se Dividió El PCV* (Caracas: Editorial Domingo Fuentes, 1971), p. 16; Benedict Cross, *op. cit.*, p. 61.

及其同伙軍事干預捷克自由化運動，提出了嚴厲的指控。他認為莫斯科的行徑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而支持這項罪行的「委共」是蘇共的幫凶。柏氏對蘇共的攻擊，立即引起「委共」正統親蘇派的震驚。當年五月柏考夫就被趕出了政治局。柏某非但不爲此一整肅行動所懾，反而於是年夏季發表一本著作：「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的問題」(Checoslovaquia—El Socialismo Como Problema)<sup>⑮</sup>，指示：蘇共數十年來對社會主義的曲解與誤用，必然不可避免地、且輕而易舉地熄滅了杜布西克爲「社會主義人道化」所發出的努力火花；而且認爲：蘇軍的侵捷行爲，已粉碎了一項促進民族取向之社會主義的成功實驗<sup>⑯</sup>。柏氏據此澈底地批判乃至清算了蘇維埃的黨政歷史及「史達林主義」<sup>⑰</sup>。柏考夫反蘇的強硬態度可與法共的 Roger Garaudy 相媲美，故爲西方的輿論界譽爲「委內瑞拉的 Garaudy」<sup>⑱</sup>。

柏考夫反蘇的言論對莫斯科所施加的無情撻伐，必然惹起蘇共的強烈反應。它透過「真理報」攻擊柏氏惡毒地歪曲了共產主義在蘇聯的建設過程，曲解蘇聯文件，以及否定了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並進而申斥柏考夫的言論是反對國際共黨所支持之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是反委內瑞拉共產黨之「反黨分子」<sup>⑲</sup>。至此，擺在柏考夫面前的只有一個選擇——另組新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的「委共」面臨着如許的難題：內有紛爭、外有蘇共壓力、少壯派的難以駕馭、領導階層的優柔寡斷、黨員的缺乏紀律感，與夫對馬列主義失去信心等，在在顯示這個共黨組織已瀕臨分裂的邊緣。

### 三、「社會主義運動」的建立及其基本政策

「委共」中央領導幹部中，包括柏考夫和馬克茲在內的五名政治局委員，以及二十二名中央委員，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宣佈脫離由馬卡篤 (Gustavo Machado) 和法里亞 (Jesus Faría) 所領導的「委共」，並於次年元月宣佈建立「社會主義運動」<sup>⑳</sup>。新成立的「社運」吸收了「委共」裏的大部份知識分子和絕大多數的「共青團」團員，並帶走了各地勞工組織中半數以上的

註⑮ 該書於一九六九年由卡拉加斯的 Editorial Domingo Fuentes 書商出版。

註⑯ William E. Ratliff, ed., 1971 Yearbook on Latin American Communist Affair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p. 161.

註⑰ Benedicti, *op. cit.*, p. 61.

註⑱ Le Monde, Oct. 23, 1970; Benedicti, *op. cit.*, p. 61.

註⑲ Pravda, Oct. 20, 1970; See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Oct. 20, 1970.

註⑳ 「社運」於一九七一年元月十四至十七日舉行第一屆代表大會，選舉出三十一名中央委員，由馬克茲擔任總書記，「社運」成員中六〇%爲委共的老幹部。一九八〇年三月的大會上，柏考夫被推選爲主席，馬氏仍擔任總書記。

工運分子。據估計，當時「社運」已擁有四千五百名以上的「黨員」，而分裂後的「委共」只剩下三至四千人<sup>⑥</sup>。

「社運」的領導階層既以知識分子與工運分子為骨幹，故在組織發展方面特別重視「社運青年團」(Juventud MAS)<sup>⑦</sup>及「工會」等外圍組織。在發展「社青團」方面，「社運」首先掌握了各地之「大學中心聯合會」(Federación de Centros Universitarios—FCU)，並透過這些大專青年組織，去影響「大學中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職位的選舉；然後再透過「大聯會執委會」主席的影響力，去控制各地的青年運動和擴大宣傳工作。為達成上述目標，目前「社運」仍然牢牢地盤踞位於卡拉加斯的委內瑞拉中央大學。該大學自一九三〇年代迄今，一直是委國學生運動的司令臺，它會直接間接地左右着委國的政局。

「社會主義運動」所一向重視的另一個羣眾組織為「委內瑞拉工人聯合中心」(Central Unitaria de Trabajadores de Venezuela—CUTV)。這個工會聯合指揮部原由「委共」在一九六〇年初所建，是一個共黨統戰的外圍機構，目前幾乎完全落入「社運」的手中。「社運」假手這個工會神經中樞，與「委內瑞拉工人總工會」(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Venezuela—CTV)發生接觸，再假手「總工會」去影響城市中下層的工人階級，穩定選票票源。

「社運」掌握了委國的「青運」與「工運」組織，因而獲得這兩個廣大羣眾力量的支持。「社運」將這兩股社會力量轉變為其組織發展的「力源」，故其力量膨脹的速度相當驚人，現在已有「黨員」十八萬，較其十年前的人數增加了四十倍<sup>⑧</sup>。「社運」在一九七八年大選中的總統選舉部份，獲得二七五、五九五票，得票率名列第三。它是委國現有的二十幾個政黨中，發展最快而最具活力的一個，是一股頗受世人矚目的政治力量。

「社運」的基本政策：「社運」建立後的次年(一九七二)秋，柏考夫又發表了第二本書，名「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Socialismo Para Venezuela?)。作者除對前書「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的問題」之重要內容予以強調及闡釋外，並為委國將來應走何種社會主義的路或需要何種社會主義，勾劃出一個清楚的輪廓，同時也為「社運」的政綱政策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從柏氏的兩本著作，以及「社運」其他領袖的言論加以分析，對「社運」的基本政策可以整理出如下的一個脈絡：

在理論方面：「社運」主張推行一種完全適合委國國情及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亦即在委國的土地上發展一種真正屬於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而非外來的列寧主義色彩、毛澤東思想色彩、卡斯楚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sup>⑨</sup>。這是參酌委國自身社會經濟（

註⑥ *World Strength of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 15.

註⑦ 「社運青年團」於一九七一年元月召開成立大會時，原名名為「社運共青團」(Juventud Comunista MAS)。而今已將「共」字去掉，此一細微末節，亦足以顯示出「社運」對共產主義及共黨所持之心態。

註⑧ 同註⑥，頁一一四〇。

註⑨ David J. Meyers, *op. cit.*, p. 20.

socioeconomics) 與政治文化背景，孕育而成之委內瑞拉式社會主義，並據此以建立一個忠於這個社會主義的「黨」——「社會主義運動」。它主張走「一國社會主義」的道路，而這「一國社會主義」還必須是「一個委內瑞拉式社會主義」。這種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主張放棄「國際主義」，否定「社會主義大家庭制」，而且特別抨擊「蘇維埃式的社會主義」。

具體內容：在經濟方面，主張大企業、銀行業等國有化（石油現已實施逐步國有化，將於一九八三年完成全部國有化目標）；國際多國公司仍准繼續存在，但須符合委國的民族利益；中小型私人企業可以照常營運，惟須接受政府的指導；主張以縮小國民所得差距的方式，達到國家財富平均分配的中間目標，進而實行經濟重建計劃<sup>②</sup>。在政治方面，主張多元主義，即多政黨、多階級並存，放棄共產主義的階級觀念與無產階級專政思想<sup>③</sup>；走議會路線，以及循政黨政治正常運作的方式，達到政權和平轉移的目標。在社會方面，主張社會改革，建立社會正義，推行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反對貪污。該「黨」以反貪污為其一九七八年競選政綱之一，曾高舉「以社會主義方式解決國家災難」的標語。在對外關係方面，堅持民族主義立場，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反對強權主義。所以，該「黨」既反對中共之攻越，又反對蘇聯之侵阿富汗，既反對卡斯楚之「革命輸出」，又反對美國之干涉主義。但在策略上仍然對美國採取懷柔籠絡的曖昧態度（詳後）。

嚴格說來，「社運」並沒有提出一套系統化、理論化的學說，而只是標榜一些基本原則或主張而已。由於「社運」自命為一般政黨，其現階段目標乃在遵循「合法鬥爭路線」，以選舉方式達到取得政權的中間目的；然後再運用其已獲得的政治權力去推行「委內瑞拉式的社會主義」。然而在鬥爭策略上，則是變化多端的。所以，柏考夫在其「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一書中曾指出：革命不能侷限於一種形式，必須準備利用任何情勢，達到逐漸取得政權的目標。因此，「社運」在爭取選票方面，採取了迂迴的鬭爭策略。例如在一九七三及一九七八年兩次總統競選中，「社運」均提名一位無黨派的社會主義人士威森特·蘭赫爾（Jose Vicente Rangel）為其候選人，而不提「社運」自身的幹部出來競選。此舉旨在擴大其統戰面和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同時也為「社運」建立其在委國內乃至整個第三世界的政治聲望，為其日後的政治前途創造一個新形象——委內瑞拉「社會主義運動」的新形象。據說，「社運」雄心萬丈，它不僅準備在一九八三年的大選中間鼎委國總統的寶座<sup>④</sup>，而且有意為拉丁美洲乃至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樹立一個楷模。

其次，「社運」亦為其今後的生存問題，作了長程的、策略性的打算。它深知在拉丁美洲的大環境和委國的次環境裏，一旦成為一個執政黨，如果成功地推行其社會主義，並有效地維護其政權，絕非易事。懷於智利阿萊德（Salvador Allende）政權

註<sup>②</sup> *Ibid.*, p. 25.

註<sup>③</sup> Benedict, *op. cit.*, p. 66.

註<sup>④</sup> Richard Staar, ed.,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0, p. 401.

在一九七三年所遭遇的厄運<sup>23</sup>，「社運」必須體認到將來可能對其政治命運構成直接威脅的兩個重要因素：其一為委國的軍人，其二為拉丁美洲長期以來的監護人——美國。「社運」為預先擺平這兩股力量，使出了馴獅師的絕招。先向委國軍事當局表示：「社運」絕對忠於民族主義，忠於國家利益，也忠於民主憲政，而且毫不妥協地反對「委共」的內外政策，毫不留情地批評蘇聯外交政策。在其應付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那隻怪手方面<sup>24</sup>，柏考夫本人最近幾年曾多次以私人身分訪問美國，以便爭取美國各階層人士對「社運」的諒解與支持。例如他在一九七四年訪問舊金山「拉丁美洲研究協會」時，向與會的學者專家表示：「社運」竭誠地希望與美國人民尤其是學術界人士，建立互諒互信的關係；同時藉機向美國人闡釋：「社運」雖屬一個急進的社會主義黨派，但在心態上仍是委內瑞拉人，所以，美國人沒有理由擔心「社運」會使委國變成蘇聯的衛星國，或步上古巴的後塵，或採取列寧主義的革命方式，或建立蘇維埃式的政治體制，或實行史達林主義的統治手段。然而他又以警告的口吻辯稱：除非美國與委國內部的寡頭政客互相勾結，或仍然相信多國公司須在委國賺取厚利，「社運」將不會在委國推行激烈的社會主義政策，也不擬建立過激的社會主義政權<sup>25</sup>。「社運」此一宣傳的目的，顯然在對美國實施先期教育，以釋其疑，以防患於未然，由此可見「社運」用心之良苦，計慮之深沉。

#### 四、第三世界的「歐共主義」？

現在要進一步地探討一個問題，即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是一個「歐共主義」模式的共黨組織呢？或者是一個第三世界的「歐共主義」者呢？果真是，它將在委國、拉丁美洲乃至第三世界之共產集團中產生什麼影響呢？這是本節與下節所要討論的兩個重點。

那麼「社運」是否在本質上屬於「歐共主義」呢？要回答或肯定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對「歐共主義」的基本概念或內涵稍作闡述，以之與「社運」的主張或基本政策（上節）相比照始可。

註<sup>23</sup> 關於阿葉德社會主義政權的詳情，以及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劫推翻時所遭遇的厄運，請參閱 Edward Boorstein, *Allende's Chi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9) 一書。

註<sup>24</sup> 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智利阿葉德政權的顛覆活動，其負責人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初向美國國會提出報告稱：自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三年，尼克森政府會為該局在智利的地下活動撥出八百多萬美元的經費。一切活動的目標在使阿葉德的馬克斯政權產生不穩而無法統治。請參閱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1974.

註<sup>25</sup> Meyers, *op. cit.*, p. 25.



「歐共主義」思潮的發展始於一九六〇年初，而這個名詞的界定與內涵則成立於西共總書記卡里奧(Santiago Carrillo)在一九七六年所出版之「『歐共主義』與國家」(“Eurocomunismo” y Estado)<sup>②</sup>一書。尤自一九七七年春，法、義、西三國共黨領袖於馬德里發表「聯合聲明」後，這個新生的名詞及其概念已普遍地被世人所知悉。而「歐共主義」的幾項基本概念或內涵可統括簡述於下：

(一)黨的地位與對共產國際所持的立場：歐共主張一國共黨應有其獨立自主與平等的地位。基於這一前提，各國共黨為適應本國特殊之政、經、文化環境之需要，其所制訂之政綱、政策，他國共黨不得置喙。各共黨在特殊情況下，為取得政權或贏得選票而採取之獨特策略及所獲得之鬭爭經驗，應受其他共黨之尊重<sup>③</sup>。「歐共主義」並主張：一國共黨應有其自身的組織形態，不一定要仿效布爾什維克的「職業革命家黨」之組織模式。

在對國際共運所持之立場上，「歐共主義」主張國際共黨間的合作關係須以獨立平等為基礎，而非忠於以某黨為首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故否認國際共運只有一個領導中心，也等於否定了莫斯科在國際共運中之「梵蒂岡」地位。

(二)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歐共主義」的政治哲學含有如下的兩個主要概念：其一係對西歐近代傳統的民主憲政體制的肯定；其二為對馬列主義的政治哲學作部份的否定。前者係確認民主、自由、多黨制、議會功能、普遍選舉、政權輪替、工會獨立、人權等政治文化具有普遍的價值。所以「歐共主義」者認為：「沒有民主政治，即無社會主義」<sup>④</sup>，「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不可分。在社會主義之轉變過程及政權之建立上，均須以人民之廣汎同意與多數參與為基礎」<sup>⑤</sup>，並確信「自由是社會主義的同義字」<sup>⑥</sup>。

其次，歐共基於民主與多數主義 (Pluralism)，主張揚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並對蘇維埃制度與極權主義給與嚴酷的批評，甚至抨擊「蘇聯是一個既非社會主義，又非民主的國家」<sup>⑦</sup>，但「歐共主義」的領導階層從未公開否認蘇聯是一個社會

註② 該書英文譯本為：Nan Green and A. M. Elliott, “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註③ Wolfgang Leonhard, Eurocommunism: Challenge for East and West, trans. Mark Vecchi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9), p. 6. 參閱吳祖田著「歐共主義」趨勢的研究：一九五五—一九七七年，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八六。

註④ 此語係出自法共總書記馬謝之口。參 Ronald Tierky, “French Communism in 1976”,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 No. 1 (Jan.-Feb. 1976), p. 42.

註⑤ Eric Hobsbawm, *The Italian Road to Socialism: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Napolitano* (Westport: Lawrence Hill, 1977), p. 78.

註⑥ 馬謝於一九七八年答覆記者問時稱。參 Kevin Devlin, “The Challenge of Eurocommun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I, No. 1 (Jan.-Feb. 1977), p. 10.

註⑦ 西共領導幹部之一的阿茲卡拉蒂 (Manuel Azcarate) 除作此一評論外，並對蘇聯的選舉制加以嘲弄。參 G. R. Urban, ed., *Eurocommunism* (New York: Universe, 1978), p. 23.

主義國家；祇表示對「蘇聯這個可怖的極權統治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前例」，社會主義的奉行者必須引以為戒<sup>22</sup>。

(三)對一國經濟政策的主張：在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分配方面，「歐共主義」主張「公有」及「私有」制同時並存的「社會所有制」，而非完全的「國家所有」及「集體所有」制。所謂「社會所有制」亦即實施有限的公有制和有節制的私有制，如具有獨佔性或壟斷性之大型企業、銀行、保險業須由國家控制，以達「經濟社會化」或「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最後目標；中小企業、手工業、農業等，仍容許繼續扮演其特有之經濟角色，但對土地投機及壟斷行爲須加以禁止<sup>23</sup>。

(四)政治運作之策略問題：在政治多元主義原則下，「歐共主義」者主張與其他左派及「進步力量」在所謂「共同綱領」(Common Program)的基礎上，建立廣汎的合作關係或「聯合陣線」；然而在涉及重大的實質利益或原則性立場時，則仍採「既聯合又鬭爭」的故伎，如西共與「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a-PSOE)的現存關係是<sup>24</sup>。

在羣眾路線方面，「歐共主義」主張與一切「遭受資本主義傷害的人民」，如經理人才、科技人員及工程師、知識分子、農民階級和天主教徒等組成廣大的「人民聯盟」(如「法國人民聯盟」)，共同遵循社會主義的道路，邁向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最終目標；但同時仍堅持在實現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須以「工人階級」為核心所組成之革命黨——共產黨，擔負起先鋒隊的使命<sup>25</sup>。法共此一主張，雖不能據以解釋為「無產階級專政」復辟，但至少仍未完全脫離馬列主義思想的窠臼。

以上僅就「歐共主義」基本概念之犖犖大者，略加陳述，以便與「社運」所秉持之基本政策和原則及其鬭爭策略等，比較檢視之。從此，吾人發現此二者的政治思想、經濟政策、黨的立場、對國際共運所持之態度，以及對蘇維埃政體、外交政策和蘇共組織形態等基本觀點(除「社運」迄今尚未公開宣佈揚棄「無產階級專政」外)<sup>26</sup>，幾乎完全相同。所以「社運」已被當代研究國際共黨事務的專家視同「歐共主義」集團中的一個孿生子——第三世界的「歐共主義」<sup>27</sup>。

註<sup>22</sup> George Schwab, ed., *Eurocommunis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Theoretical Foundation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1), p. 90.

註<sup>23</sup> Leonhard, *Op. cit.*, pp. 7-8; 見吳祖田前揭書，頁一一一。

註<sup>24</sup> Eusebio Mujal-León, "Cataluña, Carrillo and Eurocommun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X, No. 2 (Mar-Apr. 1981), p. 28.

註<sup>25</sup> G. Schwab, *Op. cit.*, p. 108.

註<sup>26</sup> 「社運」雖未公開聲稱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但從其「多元階級、多黨制度與政權和平移轉等主張推論之，在邏輯上應視之為默認地、當然地放棄了此一理論。

註<sup>27</sup> 主張「社運」與日共、澳共同屬於「歐共主義」範疇者，有里昂哈德及麥耶斯等，見 Leonhard, *Op. cit.*, pp. 16-17; Meyers, *Op. cit.*, p. 25.

## 五、「社運」可能產生的影響

「社運」既是屬於一個「歐共主義」模式的共產組織，它將在委國國內、拉丁美洲地區，以至第三世界中產生什麼影響呢？或者是否將會產生一如「歐共主義」所產生的影響呢？本節試就此作一嘗試性的探討。

「社運」目前已經產生及將來可能產生的影響，就其範圍言之，首先是對委國國內政治權力結構的衝擊，其次是對「委共」所形成的政治壓力。就其影響政治權力結構言，「社運」目前正集中全力以達成一個中間目標——取得政權。其組織發展以此為鵠的，其羣眾運動以此為鵠的，其「聯合政策」以此為鵠的，甚至其對外活動也以促進此一中間目標之實現為鵠的。所以「社運」早已養精蓄銳，準備在一九八三年年底的大選中，向委國人民乃至拉丁美洲的共黨陣營顯示其實力。

惟就「社運」現有的力量分析，在未來的選舉中，雖不足以與其他兩個大黨——「民主行動黨」及「社會基督教黨」<sup>38</sup>相抗衡，但從「社運」近年來在委國政壇上所展現的活力，以及在社會上所產生的影響力觀之，即令「社運」在這次選戰中敗北，其在委國國內的政治地位與聲望必然將會日漸提高，其在國內知識分子與勞工界所建立的形象也會因而更新，甚至可能因此晉升為第二大黨——主要的反對黨。這樣，委國政治權力結構亦將隨之改變，且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九八八年的大選，究將鹿死誰手，就難預言了。

次就「社運」對「委共」所形成的壓力言，在以往十年中，「社運」和「委共」在組織發展、選民支持、黨的形象以及影響力等方面，已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即「社運」的力量日益茁壯，而老大的「委共」則欲振乏力，且已逐漸失去人民的支持<sup>39</sup>。由此可以證明：走「歐共主義」獨立路線的「社運」比走親蘇路線的「委共」，擁有較好的發展機會，和獲得委國人民較多的支持，僅此一端，已足以為拉丁美洲其他共黨之借鏡了。故「社運」之存在已成爲「委共」之重大壓力，同時也對拉丁美洲其他共黨指示了一個新的方向。

至於「社運」對拉丁美洲其他「正統派」（親蘇）共黨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否可與「歐共主義」對「東歐集團」所產生的影響相比擬呢？換言之，西半球的「社運」是否將在此一地區發展成一種政治氣候，引導其他共黨逐漸脫離蘇共的支配，走向「

註<sup>38</sup> 委內瑞拉自一九五八年實施民主政治以來，其政權一直由「民主行動黨」及「社會基督教黨」(Partido Social-Cristiano—COPEI) 兩大政黨交替掌握之。現在的執政黨爲「社會基督教黨」，其黨魁 Dr. Luis Herrera Campín 爲現任總統。

註<sup>39</sup> 委共在一九七八年的大選中，總統競選部份僅得二八、八三五票，名列第七。在議員選舉部份，僅在眾議院內佔了一席，而「社運」則獲得七席。

歐共主義」或「社運」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呢？據筆者對拉丁美洲各國共黨的處境、政治民主化現況、經濟發展程度<sup>④</sup>、文化傳統以及人民對自由、人權等所持之心態觀之，要以「社運」自身有限的力量去發揮如「歐共主義」對「東歐集團」的影響力<sup>④</sup>，尚有一段艱鉅而遙遠的歷程。但這並非完全否定「社運」的影響力，例如它對巴西共黨所產生的間接影響<sup>④</sup>，即為一例。

如果「社運」所標榜之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能在未來的歲月中，安全地通過國內外大風大浪的考驗，將會對古巴親蘇之「一面倒」政策產生某種程度之「啓聾發聵」的作用，或至少發生某些「暗示」的效果。何況古巴並非甘願扮演蘇聯附庸的丑

註④ 一般言之，委內瑞拉在拉丁美洲諸國中，政局最安定。雖然在一九六二至六七年間，曾發生過左派的游擊暴亂，但對委國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的憲政體制，並未產生負面的影響。至於委國的經濟發展，由於近十多年來大量油元的流入，委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及國民平均所得，均列拉美各國之冠（其他多數國家在一九七八年的國民平均所得尚不到八百美元，其中平均個人所得最低者為海地，僅二百七十八美元）。茲將委國國內生產毛額及個人年平均所得列簡表於下：

國內生產毛額 (GDP)					
百萬美元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三	一九七〇	一九七五	一九七七	一九七八
七、六六三	七、〇八九	一一、四三二	二九、二五三	三五、七七二	三九、六七五
平均個人所得					
一美元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三	一九七〇	一九七五	一九七七	一九七八
一、〇四三	八七一	一、一一一	二、四四〇	二、八〇八	三、〇二四

資料來源：U. N. 1979/80 Statistical Yearbook, p. 695.

註④ 「歐共主義」對「東歐集團」所產生的影響力，是積極而持續的。例如一九七七年夏季，東柏林一名工廠的共黨領導幹部 Rudolf Bahro 要求東歐各國建立一個「歐共主義」取向的「共產主義者聯盟」(Bund der Kommunisten)，以便促使東歐實施「歐共主義化」。次年春，東德的「社會主義統一黨」(Socialist Unity Party)的一羣中上級官員，組織了一個「德國民主共產主義者同盟」(The League of Democratic Communists of Germany—BDKD)的秘密團體，發表宣言，主張東德應推行「歐共主義」模式的社會主義。請參 Jiri Valanta, "Eurocommunism and Eastern Europ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II, No. 2 (Mar.-Apr. 1978), pp. 52-53.

註④ 巴西共黨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已逐漸疏離與蘇共的關係，並與西班牙共黨和義大利共黨加強接觸。最近（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巴西共黨發表一項書面聲明，要求其黨員團結一致，遵循國家民主道路及發展民主多元主義等，以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目標。

角，而是看在盧布的分上，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卡斯楚早已體認到，在其「天然盟友」的羈縻下，無論在內政或外交方面，均已失去迴旋的餘地，而今在「社運」的鼓勵下，或許將會調整其現行的親蘇政策<sup>③</sup>。

## 六、結 論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運動」自脫離「委內瑞拉共產黨」以來，即獨樹一幟，在西半球走「歐共主義」的路線，與西歐的西共、義共遙相呼應，形成國際共黨的另一股分裂力量。「社運」在國際共運中標榜「一國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路線，已在拉丁美洲的共黨世界中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和示範作用，並對蘇共的部份理論、對外政策以及領導權威，予以正面的攻擊，使原已四分五裂的國際共黨和已名存而實亡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續向破滅的邊緣邁進了一大步。

當代研究國際共黨事務學者，對「社運」的看法分為兩派。一派為持「肯定主義」的「樂觀論」者，另一派為「悲觀主義」的「懷疑論」者。前者認為如果「社運」對內對外繼續認真執行其既定政策，遵循其現行的溫和路線，並尊重政黨政治運作的規範，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而又能按照「多元主義」的常規，進行政權之和平輪替，那麼，「社運」不僅將為自身的政治前途鋪平康莊的道路，並將為共產集團樹立一個史無前例的政治楷模，以資取法。這種期許性的瞻望，當然係根據「社運」所揭櫫的主張而作出之邏輯性、理念性的推理，但這項審慎樂觀的結論，尚須留待今後的事實去驗證之。

相反的，對「社運」持悲觀主義的「懷疑論」者認為：這股新興的共黨力量，其所秉持的主張與夫現行的政策，究竟是共產主義本質的蛻變呢？還是僅僅代表共產運動中的新方向、新模式？抑是爲了適應客觀環境及爭取選民支持，而採取的一時權宜之計呢？或是在多黨制的政治競技場上所施行的一種政治策略？「懷疑論」者不但面臨這一連串的問題，而且認爲「社運」和「歐共主義」者一樣，迄今尚未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個缺點將構成他們缺乏穩定性的根源；同時更認爲：「社運」自身仍存在着某些矛盾，例如主張在重建（而非改革）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時，仍須以「共黨爲先鋒」（「社運」則稱「社會主義運動者」—MASists）去完成此一歷史使命。此一理論乃與「多元主義」和「多階級並存」的原則相違背。

其次，「懷疑論」者的另一置疑點則爲：共產黨人（不論其名稱爲何）在辨證邏輯的長期黨陶下，善變性與詭譎性已成爲其意識形態之重要組成部份，而且也是他們分析事物和制訂政策時之思維規律，因此，當其面臨利害攸關的重大問題時，隨時可能

註③ David J. Meyers, *Op. cit.*, p. 26.

轉變其態度，改變其政策，更換其策略。一旦面臨嚴重的挫折時，是否會重返一九六〇年代初武裝鬭爭的老路呢<sup>④</sup>？或一旦取得政權後，是否會效法一九四五年代左右各東歐共黨一黨專政的故伎呢？這些問題都是使人難以釋疑的。

筆者認為：「社運」雖有十餘年的政治經驗，但作為一個第三世界的「歐共主義」者，無論其主張、其政策、其策略，仍處於一個探索與嘗試錯誤的階段。在此過程中，如能善於適應委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傳統以及社會心理等條件，或可不致逸出政黨政治的常規，遭遇到重大的挫折，發生悲劇性的結局。然而吾人必須切記：「一朝為共產黨人，將永遠是共產黨人」這句諺語的哲理。

註④ 「社運」的總書記柏考夫曾於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七年擔任「民族解放陣線」(FLN/FALN)作戰指揮部的指導委員。據稱：「社運」目前仍然與委國東部邊區的殘餘游擊勢力有接觸，尚保持者藕斷絲連的曖昧關係。Ibid, p. 27.

## 新書介紹：「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甚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  
國內——(郵掛)新臺幣一〇元  
國外——平郵 美金三元  
航空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